

FENG YOU LAN ZHE XUE SHENG MING LI CHENG

冯友兰哲学生命历程



著

中国言实出版社

冯友兰哲学生命历程

金春峰/著

中国言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冯友兰哲学生命历程/金春峰著.

—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4.11

ISBN 7-80128-605-7

I. 冯...

II. 金...

III. 冯友兰(1895~1990)—哲学思想—研究

IV. B26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12158 号

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

邮 编:100101

电 话:64924761 64924716

网 址:www.zgyscbs.cn

E-mail:zgyscbs@263.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版 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787×1092 1/16 16.75 印张

字 数 343 千字

定 价 28.00 元

作者简介

金春峰,男,一九三五年生,湖南邵阳人,北京大学哲学系学士及中哲史硕士。历任人民出版社哲学编辑室主任、《中国哲学》副主编、《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常务副主编、中国文化书院导师;一九八八至一九八九年,任新加坡东亚哲学所高级研究员;一九九〇至一九九八年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访问研究;一九九九年后,历任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华梵大学东方人文思想研究所客座教授,现任佛光大学哲学研究所客座教授。专著:《汉代思想史》、《周官之成书及其反映的文化与时代新考》、《哲学:理性与信仰》、《朱熹哲学思想》、《“五四”后思想、人物论集》(与刘笑敢等合著)、《周易经传梳理与郭店楚简思想新释》。

自序

自1998年10月开始,经历近两年的劳作,《冯友兰哲学生命历程》终于完成了。

我是冯先生的学生,但本书并不墨守师门、家法,或对先生空泛地颂扬,而是对先生之哲学思想进行分析剖析,与之互相讨论,既肯定又批评的作品;体现的是一种“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自由开放学风。

但这学风,是冯先生自己所示范的。在北大,他听过梁漱溟先生的课,是梁先生的学生。留美时读梁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深深服膺其创见,但并不一味盲从。在《一种人生观》、《评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及《致梁漱溟书》中,他对梁先生的著作尖锐而又极有深度地提出批评,并引亚里士多德的话:“朋友与真理,皆我们所亲爱者,但宁从真理,乃是我们的神圣的义务。”^①我对于冯先生的评论亦出于此一精神之鼓励。

冯先生治学的思想与学风是开放的。“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是他向学生倡导的惟一学术标准。他鼓励学生“读书有间”,能有独立的见解^②。如果事事只死守师说,有护卫师门之意而无探索求真之心,实际是冯先生所不取的。

冯先生在批评梁先生之后说:“至于我所说者,是否真理,则须待讨论,方能明白。我只希望我没有误会了梁先生的意思。我的批评,可以算是一个同情的讨论。”^③又说:“先生思想迥绝恒蹊。以上随便批评,未必不出于对于先生所说有未能领会之处,先生或一笑而置之,然现在所见实是如此,不敢不直言也。”^④这也正是我在本书所取的态度。只是冯师已经作古,不能面呈此稿于先生之前,或一笑而置之,或有所回应指正。这是令人伤感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

① 冯友兰:《一种人生观》,《三松堂全集》,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1994年,第1卷,第574页。

② 参阅本书附录:《我与冯友兰先生》。

③ 冯友兰:《一种人生观》,《三松堂全集》,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1994年,第1卷,第574页。

④ 同上书,第14卷,第31—32页。

霏。”1988年,临别嘱托,言犹在耳^①。再见时,则只有花岗石的墓碑供凭吊纪念,令人无限伤情。“逝者如斯”,只能感慨系之矣。

冯先生将自己的哲学活动分为五个时期:第一时期为1915年进入北大至1923年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写成博士论文《天人损益论——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第二时期为1923年《一个新人生论》出版;第三时期为1926年到燕京大学讲中哲史至1935年《中国哲学史》上下卷出版;第四时期为抗日贞元六书之新理学哲学体系的建立;第五时期为1949年后以马克思主义重新研究中哲史。

第一时期,冯先生自认是“‘五四’运动的一个对立面,跟当时的国粹派和国故派在本质上是一样的。”^②本书看法恰恰相反。在“五四”新文化或东西文化讨论中,冯先生是站在新思潮方面的;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看法,正好是认为应予批评与否定的看法。虽受梁漱溟的深刻影响,立场、观点、结论,两者却很不相同。

第二时期,1923年的科学玄学论战中,冯先生鲜明地站在科学派方面,而对梁漱溟、张君勱所代表的玄学、直觉说,进行批评。

第三时期,冯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完成的《中国哲学史》,因其原创性、完整性、系统性(自先秦至清)及取材严谨,哲学观点与资料紧密结合,说理清楚明确,分析细致深入,文字流畅简明,在中国和世界广为学者、学生所习读,可以说培养了无数的中哲史工作者。但冯先生对孔子的态度不是胡适所谓正统派的,或自己所称尊孔的,而是批评康有为之今文经学之尊孔观,否定孔子是教主、素王、圣人,而树立孔子为一教授老儒、学者、教育家、思想家。对孟子至陆王的“心学”,冯先生以其立论根据,纯系“假设”。对程朱,虽以继承的新理学自任,但对朱熹的新实在论式的诠释,实际是不符合朱熹思想的。对仁义道德的解释,以社会功利为基础,也与朱熹及宋明理学不相应。《中国哲学史》对各家虽一视同仁,取客观的学术研究态度,但冯先生所信奉的是新实在论哲学,因而又是以这种哲学去理解和诠释中哲史的。

第四时期,冯先生创立了新理学哲学体系,将理性主义哲学与中国的传统哲学相结合,深化了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也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哲学与理论思维的水平;其境界说更是对中国哲学宝贵遗产的继承与创造性发展;但其达到天地境界的方法,实际是与道家或郭象、新道家一类,而与儒学精神并不相侔。

在《新事论》中,冯先生对社会文化与历史的看法,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标,与《新原道》的思想亦不协调。

第五时期,1949至1990年,是冯先生的新理学与马克思主义之矛盾纠葛的时期。在冯先生的自觉意识中,新理学的本体观与《新事论》的社会历史观是不矛盾

① 参阅本书附录:《我与冯友兰先生》。

② 冯友兰:《四十年的回顾》,《三松堂全集》,第14卷,第200页。

的。客观上,两者对人的看法,都以人为理性的存在,都承认规律的客观性,因而新理学确为冯先生向马克思主义的靠拢和转变,提供了思想基础。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批判的、革命的、实践的、政治的、意识形态性的,以坚持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为基础,且无时无刻不在变化。因此,书本上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并不能使冯先生真正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冯先生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实际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乃至黑格尔的逻辑、历史、辩证法、认识论相统一的精神,很不相契的。因而,主观愿望与客观实际存在巨大的落差与矛盾。

作为一个真正书斋型,毕生在书房内,在哲学与哲学史的概念游戏中自得其乐的学者,冯先生与政治、与社会现实的距离是很大的。也许有为帝王师的期盼,但外面的东西始终只是掠过他心头的一丝掠影,概念王国则是深藏周纳,根深蒂固于中心的安身立命之地。正如宗璞先生所说,各种知识分子的处境很不相同,“有居庙堂而一切看得较为明白,有处林下而只能凭报纸和传达,也只能信报纸和传达。”^①先生是属于后一类的。于是不能避免风暴来临时的挣扎与震撼,不能逃过触及灵魂的革命的痛苦与呻吟。乐亦在它,苦亦在它。冯先生的一生是在哲学概念游戏的欢乐与痛苦中度过的。但他给后人仍然留下了丰富的哲学遗产,深刻的人生经验与启示,是值得珍贵的。蔡仲德教授说,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哲学史》到80年代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冯先生经历了一个自我丧失和自我回归的痛苦过程。这过程实际也是上述的情况造成的。

我这次有幸能有机会较仔细全面地阅读冯先生的著作,仿佛和他一起重新经历了20世纪中国的历史与哲学的历程。回首往事,冯先生后半生的哲学处境,某种程度上我亦是参与其中的,有欣慰,亦倍感神伤。

本书在理论观点上与冯先生有几点重大不同。

冯先生以哲学为概念游戏,对共相、殊相的关系这一哲学问题特别关注与执著。冯先生在新理学哲学体系中所表现的对人的看法,实际是以人乃理性的存在、乃理性的动物为基础。本书则认为人并非仅仅是理性的存在,亦是天生具有信仰、并以此与动物相区别的存在。儒学的天道观、心性论,实际是与“信仰”背景相联系的。哲学的神秘主义,特别是儒家哲学在境界上的神秘主义,亦是与其心性、从而与“信仰”背景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冯先生处于“五四”以后之崇尚科学、理性(与情欲、直觉、迷信相对立)而贬斥信仰的新文化思潮的影响之下,则恰恰忽视或批评与贬抑这点。因此对儒家的天地境界、特别是孔子的这一境界不能有正确的评价。

关于《礼记》之丧礼、祭礼之理论,冯先生认为乃荀子思想之表现,本著则认为系孟子心学的结晶。

① 宗璞:《三松堂断忆》,载陈岱孙等著:《冯友兰先生纪念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78页。

冯先生对汉代儒家,特别是董仲舒哲学评价甚低,忽视其目的论思想所带来的崇尚人、提高人的地位的人文主义思想方面,本书则突显了这一方面。

冯先生不重视朱熹哲学与佛禅的内在联系,与传统儒学的目的论及中国农业生态之文化特殊性之联系,以致对朱熹哲学的性质作了不符合朱熹哲学实质的诠释。

后期,冯先生特别重视心学内部主观唯心论与客观唯心论的区别,肯定有“宇宙的心”。但何谓“宇宙的心”?“宇宙的心”与个体的心关系如何?冯先生却没有展开。本书及我的另一些著作,如《朱熹哲学思想》则将其展开了。

归根结底,冯先生以为无论古今东西,哲学皆是哲学家思之所见,而所见皆同,强调哲学的普遍性。在其自觉的意识中,中国哲学史乃哲学之在中国的历史,而非中国的哲学史。本书则强调哲学问题虽无东西之别,但每个哲学家皆是某一民族的打上了自己民族的深深文化与时代烙印的哲学家,故哲学问题其表现与内涵并不相同。

但上面这些,正如冯先生给梁先生信所说,理论上是否正确,都是值得讨论的。但实见如此,不敢不据实提出,以就教于哲学界的同好。

希望这本著作能吸引更多人,重新回顾与总结 20 世纪的中国哲学,以开拓出更新更有深度、更有中国人自己之创意的哲学作品。

近两年了,路上、厕上、枕上,朝朝暮暮,几乎无日无时不沉浸于冯先生哲学生命历程的思考之中,可谓殚精竭虑,敬肃认真,惟恐失之轻忽、偏差、浮浅。现在终于完稿,可以呈现于读者之前,如释重负,精神为之一快。

诗曰:

十年教诲岂敢忘,下笔评论费思量。
独立思考先生倡,尊师更当道弘扬。
众人传薪火焰高,抛砖引玉是所望。
后浪前浪相激扬,浩浩大江奔东方。

序于台北

目 录

自 序	1
-----	---

冯友兰先生总论——一个毕生游戏概念、哲学即生命的人	1
---------------------------	---

第一时期 1919—1926 年学贯中西

追随新思潮——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学之分析	11
一、中国有一条向内的路线	11
二、采梁先生的观点	15
三、和梁漱溟的不同	22
告别玄学与“直觉”——对科玄论战的总结	24
一、“五四”思潮的继续	24
二、惟理智能解决人生观问题	26
三、告别直觉说	28
四、对哲学与人的看法	31
进入中哲史研究——以道释儒	35
一、将哲学划为三派	35
二、以道释儒	38
三、1926 与 1927 年的分界	41

第二时期

1927—1935 年完成《中国哲学史》上下册

论孔子——摘掉三个桂冠	45
一、摘掉三个桂冠	45
二、旧制度的维护者	50
三、对仁的分析	51
论孟子与荀子——荀学成为儒学的主轴	54
一、以新实在论诠释孟子	54
二、荀子、《大学》、程朱为一系	56
三、《礼记》丧祭礼思想是荀学还是孟学	59
论老子、庄子与公孙龙——哲学分析的范型	63
一、发生程序与叙述程序有别	63
二、论老庄思想的区别	67
三、中国第一个“实在论”者	69
论汉至魏晋哲学——发现郭象	72
一、误解汉代哲学发展的主线	72
二、忽略王弼哲学的理论背景	76
三、发现郭象	77
论新儒家——新实在论式的诠释	81
一、对朱熹的理气观与心性说的诠释	81
二、对格物致知说的诠释	87
三、朱陆、朱王异同	89
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有益的启示	93
一、强调哲学的普遍性	93
二、特殊性的揭示与疏略	98
三、哲学思想之历史性	102
四、哲学与哲学史	105

第三时期

1935—1948 年建立新理学哲学体系

新形上学的重建——《新理学》分析(一)	109
一、由形式逻辑而入哲学并信奉新实在论	109
二、新形而上的建立	113

三、辨名析理	115
理、气、道体的证立——《新理学》分析(二)	119
一、理的具体论证	119
二、气概念的具体论证	126
三、“道体”的特征	129
道德境界说——社会功利论的道德观	132
一、理智的觉解	132
二、功利主义的道德	135
三、并非孔孟儒学的精神	137
天地境界说——与向、郭更为接近	140
一、知天、事天	140
二、同天	143
三、关于同天境界的神秘性	145
中国哲学之精神——新理学所真正承接的	149
一、孔孟的境界并不高	149
二、道家的境界是高明的	151
三、玄学统一了高明与中庸的对立	153
四、对张载与朱熹的误解	156
五、新理学所承接的	158
中国到自由之路——接受历史唯物论	161
一、生产方式决定社会性质	161
二、哲学、道德等并无民族性	166
三、反对本位文化论	168
新理学的成就与中国哲学近代化的讨论	
——哲学近代化的困境	173
一、倡导理性主义	173
二、中国哲学精神的探讨	176
三、哲学方法论的探讨	178
四、哲学近代化的探讨	181



第四时期

1949—1990 年重写中国哲学史

新理学与马克思主义——由疏离到认同	187
一、严重的隔膜	187
二、新旧交替中的困境	190
三、由疏离到认同	193
从争鸣到〈四十年的回顾〉——新理学的自我否定	197
一、早春的争鸣	197
二、严重的冲击	201
三、新理学的自我否定	204
六十年代的新论到七十年代的“批孔”——又一次自我否定	209
一、与关锋在孔子评价上的对立	209
二、老子看法上互别苗头	214
三、又一次自我否定	216
〈中国哲学史新编〉之新——不再依傍旁人	220
一、突破流俗的马克思主义	220
二、恢复新理学的“灵魂”	223
三、重回境界说	227
最后的总结	230
一、重回以前的哲学观	230
二、突出公私义利之辨	232
三、回到张载	234
几个有争论的问题	237
一、尊孔与“批孔”	237
二、同情的了解	241
三、是否是新儒家	243
四、关于“冯友兰现象”	245
附 录：我与冯友兰先生	248

冯友兰先生总论

——一个毕生游戏概念、哲学即生命的人

冯友兰先生生于 1895 年，河南唐河县人。1915 年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18 年毕业；1919 年追随《新潮》，在开封创办《心声》杂志；1919 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1923 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北京大学教授。1990 年 11 月 26 日逝世。著作集结为《三松堂全集》共 14 卷，主要是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哲学史》上下卷；40 年代《新理学》等“贞元之际六书”及 1949 年后《中国哲学史新编》共 7 卷。

——

冯先生生活、工作、奋斗的时程，中国处在艰困、苦难、多变，一度是民族危亡的年代。冯先生一生最受后学景仰、钦敬与深受感染的，是其深厚忠贞的民族与爱国主义精神。此种精神提供其一生为人处世与著书立说，龟兔勉勉，鞠躬尽瘁，至死方休的内在动力。不是为哲学而哲学，为学术而学术，为历史而历史，而是为了贡献一己之所长以为民族文化哲学增添光彩与活力，以参与民族振兴与复兴的大业。故无论是“五四”创办《心声》，参与《新潮》，或带着中国何以积贫积弱的问题赴美留学，寻求答案；或写作中国哲学史，证明中国文化亦有其与西方相同的哲学智慧；写作贞元之际六书，建立哲学体系；抑或 1949 年迎接解放、接受马克思主义，重新编写中国哲学史，冯先生莫不是怀抱著爱国与期盼民族、民族文化复兴的精神。

在《新理学·自序》中，冯先生说：“去年中日战起，随学校南来，居于南岳。所见胜迹，多与哲学史有关者。怀昔贤之高风，对当世之巨变，心中感发，不能自己。”“此书虽‘不著实际’，而当前有许多实际问题，其解决与此书所论，不无关系。故虽知其中必仍有需修正之处，亦决及早印行，以期对于当前之大时代，即有涓埃之贡

献,且以自珍其敝帚焉。”^①《新世训·自序》则说:“承百代之流,而会乎当今之变。好学深思之士,心知其故,乌能已于言哉?事变以来,已写三书。曰《新理学》,讲纯粹哲学。曰《新事论》,谈文化社会问题。曰《新事训》,论生活方法,即此是也。书虽三分,义则一贯。所谓‘天人之际’,‘内圣外王之道’也。合名曰《贞元三书》。贞元者,纪时也。当我国国家民族复兴之际,所谓贞下起元之时也。我国国家民族方建震古铄今之大业,譬之筑室,此三书者,或能为其壁间之一砖一石欤?是所望也。(民国二十九年二月,旧历元旦。)”^②《新原人·自序》则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哲学家所应自期许者也。况我国国家民族,值贞元之会,当绝续之交,通天人之际,达古今之变,明内圣外王之道者,岂可不尽所欲言,以为我国家致太平,我亿兆安心立命之用乎?虽不能至,心向往之。非曰能之,愿学焉。此《新理学》,《新事论》,《新事训》,及此书所由作也。”^③在《南渡集·自序》中,又感慨说:“集而名曰南渡者,以此选集纪念此段之中国历史及个人经历也。稽之国史,历代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吾辈亲历南渡,重返中原。其荷天之休,可谓前无古人也已。(民国三十五年八月)”^④无怪所作《西南联合大学进行曲》及纪念碑文,现在读来还是那样令人感奋、充满胜利的豪情与喜悦: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夏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⑤

千秋耻,终已雪。见仇寇,如烟灭。大一统,无倾折。中兴业,继往烈。神京复,还燕碣。^⑥

冯先生就是以这样高涨的爱国热情贯注于哲学与哲学史工作的。因其如此,故其哲学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与写作,也真正把中国文化与哲学之杰出的智慧与精华展示出来。两者之关系犹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轮,相互为用而相得益彰。其研究的劳绩不仅成为中国文化与哲学之仍然有其勃勃生机与活力的证明,鼓舞了他自己,也鼓励了处于艰难困顿中的奋斗的人们。

也正是本着这种精神,1949年以后,冯先生重新以马克思主义阐释中哲史,亦历尽艰辛而不悔。逝世前夕,当《中国哲学史新编》第7册完成的时候,冯先生担心着它的不能出版,但还是对中国文化与哲学的未来充满希望。“吾其为王船山矣”^⑦,王船山以自己的著书立说为往圣继绝学,为中国文化与哲学开生面。冯先生

①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4卷,第3页。

② 同上书,第369页。

③ 同上书,第511页。

④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5卷,第273页。

⑤ 冯友兰:《校歌词》,《三松堂全集》,第14卷,第15页。

⑥ 冯友兰:《凯歌词》,《三松堂全集》,第14卷,第16页。

⑦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蓝灯出版公司,1991年,第7册,第1页。

以此自勉自期自许。他的心与生命,他的研究中哲史,确是自始至终都自觉地与民族之命运相联系的。

二

“五四”后至 1949 年,中国史学、文学、哲学各个方面,大家辈出,有如满天繁星。但能以哲学与中国哲学史名家且蜚声海外者,则惟冯友兰先生。

早在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时,杜威推荐先生,即说“是一个真正学者的材料”^①。实际上,冯先生不仅是学者的材料,而且是真正哲学家的材料,真正具有哲学的气质与天赋。

胡适一度也以研究哲学著称,并自期能有整部中国哲学史之作,但一生都不如愿^②,盖胡是真正学者的材料而不是哲学家的材料,故在文学、政治、学术史及一般思想史方面,胡取得了巨大成就,而哲学则见识浅薄。冯先生则兼具两者的特质,特别是哲学家的特质。故“五四”后,冯先生不仅完成了中国第一部完整的中国哲学史,也建立了第一个中国哲学体系——新理学。

金岳霖先生 20 世纪 40 年代有《论道》之作,其哲学体系和冯先生的新理学是同类的;但金先生的特长是严密的逻辑分析,极富逻辑学的天才,其建立的体系也带有鲜明的逻辑特质。它是严格意义的“在中国”的哲学。冯先生兼具哲学与学者——集文史哲于一体之中国国学之特质,故成为一贯通古今、兼综中外的哲学与哲学史家。其《新理学》既是真正哲学的著作,亦是中国哲学史的著作。新实在论使这个体系具有哲学的灵魂,中国哲学史则使这个体系有血有肉,富有中国气息。这使《新理学》在抗日时期享有远较《论道》更广泛的影响与读者;也使中国传统哲学在近代面临西方文化冲击以后,又一次取得了一全新的面貌。

《新理学》以一个哲学原理一以贯之地说明了宇宙、本体、认识、伦理与哲学方法,乃至家园、道德、修养等等,简言之,即修齐治平和内圣外王的全部,并旁及美学与文艺。在所有各个方面,它的见解都能发人深思。如关于美学,他曾经指出:“就普通所谓真善美说,‘真’是对于一句话说的,‘善’是对于一种行为说的,‘美’是对于一种形象说的。”^③“人不能专凭直觉说一句话是真,但可以专凭直觉说一行为是善,一形象是美。不过人可以离开人的感觉说善之所以为善,但不可以离开人的感

①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三松堂全集》,第 1 卷,第 337 页。

② 胡适在 1950 年 1 月 5 日的日记里,说:“前些时曾见冯友兰的 *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实在太糟了。我应该把《中国思想史》写完。”(《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 17 册。)

③ 冯友兰:《南渡集》,《三松堂全集》,第 5 卷,第 476 页。

觉说美之所以为美。这就是说,感觉并不是构成善的要素,但是构成美的要素。这就是真善美的一个不同之点。”^①话虽简短,但大陆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学讨论,朱光潜先生所讲的美学理论,美是主客观的统一,也不过是这几句话的展开。

可以说,哲学、新实在论哲学,已变成了冯先生的一种生活与思维方式。故几乎任何大问题的思考、讨论,我们都可以看到新实在论在起着方法论与构造间架的作用。也可以说,冯先生是带着他的哲学走完了从青年到老年的全部人生。

哲学真正是冯先生的生命与灵魂。

三

在清华,冯先生感到骄傲的,是他与金岳霖先生一起,建立了新实在论学派。所以,和梁漱溟不同,冯先生之研究中国哲学史,并不是为了替孔家作宣传,为孔家建立正统或道统的。胡适说,冯先生把孔子排在中哲史的第一位,是因其所持的尊孔的正统派意识形态^②,这是把冯先生弄错了。

冯先生以中国哲学史名家,享有声誉,是因为他的哲学史除其他种种优点外,最主要的是他使它成了一部真正的哲学史,使人人从中可以看到、学到真正的哲学而非任何正统的意识。而此哲学不是别的,就是冯先生所信奉的欧美的新实在论哲学。

在以后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中,冯先生不仅解公孙龙、程朱是用新实在论的哲学方法及架构,如同 30 年代的旧著《中国哲学史》,解老子、魏晋玄学、王弼、郭象,也都在其中贯串着新实在论关于共相与殊相、一般与个别之关系的见解。这使冯先生的中哲史极富哲学味,也使冯先生的中哲史几乎成为哲学之在中国的哲学史。故《中国哲学史新编》最后所回到,也是那个最一般的新实在论哲学方法。哲学如果有开始和终结的话,那么,冯先生所开显的中国哲学,是从老子的有无——共相、殊相始,而以王船山与张载的哲学终。故冯先生始终是忠于他所理解的哲学,而不是忠于哪一个特殊的中国哲学学派。客观上,冯先生所理解的哲学,在纯哲学上与他所诠释的朱熹哲学同类,亦与老子、公孙龙、王弼、郭象同类。在哲学的无用之大用上,则更多地与郭象同类。

四

冯先生被认为是很保守的人。实际上,冯先生是能敏锐地接受新思想、很趋新

① 冯友兰:《南渡集》,《三松堂全集》,第 5 卷,第 480 页。

②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年,上册,《自序(二)》,第 1 页。

的人。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冯先生与傅斯年的思想一致，到美国后，还被接纳为新潮社的成员。哲学上，最早信奉柏格森生命哲学与直觉说，随即转到实用主义，不久又转到新实在论。社会政治思想上，20世纪20年代接受与赞扬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1925年去当时的革命根据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1935年休假去欧洲，阅读与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并到苏联这个20世纪30年代被中国左翼知识分子崇敬和向往的国家参观。回国后，毫不掩饰地表示赞美欣赏之情，以之为尚贤、尚能、公平合理的社会。在接受过欧美自由主义与民主教育的留学生与教授群中，这是极为罕见的。哲学上，冯先生持欧美的新实在论，历史观上却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并以之观察中国的历史、文化问题，认为是中国将来应走的道路，这是很“自由”主义的。一直到1949年，冯先生迎接北京和全国的解放，学马列，接受思想改造，可以说都是其一贯勇于向前和趋新的表现。

故在1949年以后激烈多变的社会改造与思潮变化中，毫不奇怪地，冯先生亦是随社会政治思潮的变化而变化自己的态度与思想。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中国哲学史新编》为阵地，一方面不断探索，提出种种新说法；一方面却不断向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哲学回归，这与此时期的思想解放、文化热潮也是很合拍的，是从中汲取了灵感与力量、勇气的表现。

学风上，冯先生虽然反对泥古派、信古派，又反对疑古派，而提倡释古，但其释古信守的只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这一标准。所以改变看法不仅是允许的，而且也是家常便饭。如对老子“道”的看法，最早以之为即是自然；稍后，在《中国哲学中之神秘主义》一文中，以之为“唯物论”^①在《中国哲学史》中以之为万物所从出之总原理。在《新理学》、《新原道》中，则以之为原始的“气”。《中国哲学史新编试稿》，以之为阿拉克西曼德的“无限”^②。到《中国哲学史新编》，则据马王堆帛书，以之为“共相”、“一般”。

对孔子的政治立场，最早以之为旧势力利益的维护者，20世纪50年代仍采此种看法。20世纪60年代，则以孔子为新的地主阶级的代表，站在时代与历史的前列；“批孔”中又回到20世纪30年代的观点。

对朱熹的“格物致知”，在《中国哲学中之神秘主义》一文中，认为姑无论其所达“神秘主义的境界为何，但以智识的知识求之，实乃南辕北辙。”批评“朱子亦不能言格尽天下之物如何能转到万物一体之境界，特以‘而一旦’三字为过渡，亦勉强极矣。”^③在《中国哲学史》中，则谓“此格物之修养方法，自与其全系统相协和。盖朱子

①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11卷，第95页。

②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7卷，第274页。

③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11卷，第102页。